

筱原令



中國

〔日〕筱原令 著



學林出版社

筱原令

看

中國

〔日〕筱原令 著

杨锡坤 译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筱原令看中国/(日)筱原令著;杨锡坤译. —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486-0523-2

I. ①筱… II. ①筱… ②杨… III. ①杂文集—日本
—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045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3-290 号

筱原令看中国



著 者——[日]筱原令

译 者——杨锡坤

责任编辑——钱丽明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6.25

字 数——9 万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523-2/I·77

定 价——25.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主要译自日本侨报社 2010 年 10 月出版的《新编认知中国》一书。该书作者筱原令是一位通晓中文、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日本作家。有鉴于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的反华言论,他写了这本书,按他的话说,“就日本人难以理解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的特征(无论好的一面还是不好的一面)作一个总结归纳”,以期让日本人放弃成见,更好地了解中国、认知中国。

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社会现实作了评述,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和赞赏,认为“中国高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旗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对的”。同时,他对当前日本国内的反华言论持批评态度,认为日本只知道“追随美国”,“只知道所谓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保障’,没有独立的哲学和思想”,指出“日本自满地夸耀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日本只有“和中国一起前进,才有日中两

国的未来”。作者这些观点代表了日本民间进步力量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对于推动中日两国友谊发展,无疑传递出一种正能量。

当然也要看到,作者是日本人,他是从日本人的角度去观察和解读中国的,为了更好地让中国读者理解这本书,我们在不影响文章观点和思路的前提下,对其中的一些表述作了修改和调整。同时,书中就某些问题阐述的观点可能不一定准确,跟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评判有一定的差异,但为了尊重作者的观点,我们还是不作修改,一如其旧。这些地方,相信读者自会注意分析。另外,为方便读者,我们对书中涉及的日本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等专有名词,按照我国的权威工具书如《辞海》等加了注。

还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曾经写过《找朋友还是中国人好》一书,主要讲述作者的一些中国朋友的故事。该书于2003年译成中文出版。经作者同意,我们从中选取部分文章增补到这本书中,从而使本书的结构更为合理,内容也更为丰富。

由于这是一本日本作家看中国的书,也是推荐给中国读者阅读的书,用《筱原令看中国》作为书名可能更贴合本书的内容和主旨,经征得作者同意后,我们将本书改为现名。

2013年7月

序

余秋雨

—

为别人的书写序,对我来说是一件隆重的事情。

我曾应一些出版家之邀,为中国那四部古典小说,以及纪晓岚和李渔的文集写序。那活儿,相当于重启一项学术研究,又要寻找到把这些作品推荐给当代读者的充分理由,很不容易。但是,那毕竟是介绍遥远的古人古书,虽不容易也可以表现得通脱、潇洒,相比之下,为今人的书籍写序就更不敢了。除非,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什么样的特殊原因?例如,前些年我曾为一位欧洲青年旅行家的书写序,原因是,他沿途的感受居然与我惊人相似。我又为日本当代艺术家团伊玖磨的散文全集写

序,原因是,他每年九个月蛰居小岛、三个月漫游世界的生活安排,是我长久的理想。今天是第三次为一个当代外国作家写序了,理由没有前两个好玩,却让我十分心动。

这个作家,就是日本的筱原令先生。他在全书的前言说:

走进日本的书店,一眼望去,与中国相关的书架上全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无赖论”之类的反对中国、厌恶中国、污蔑中国的腔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日本这边反中、厌中、蔑中一面倒,中国那边的反日情绪也很高涨。其因果关系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以判断。

是不是因为信息受阻而产生了误会?不是。即便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信息够直接了吧,也有这种一面倒的集体心理。筱原先生又写道:

每当在中国的日本人聚在一起时,总要说些中

国和中国人的坏话，什么政府方针朝令夕改啦，什么中国人不守信用啦，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凡是进展不顺利的事，都是中国方面的责任。可是我不禁要问：既然是如此不如意、不舒服，为什么不干脆回日本去？

正是针对这种现象，筱原先生写了眼前这本书《筱原令看中国》。而我，也产生了阅读这本书的动力。一读，写序的理由也建立了。

二

毫无疑问，筱原先生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难题。

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政治、地缘等等方面来解释，很多学者也都在这样做。但显然，那么多反华书籍的作者，那么多聚集在中国说中国坏话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不是政客，年纪也未必太老。因此，事情要比学者们解释的严重得多。

筱原先生在书中诚恳地表示，日本人应该与中国人一道为人类作出贡献，所以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理

解”。他知道自己的作用不会很大,只是期待“给读者带来一点点启示”。

这“一点点启示”,主要集中于“日本人难以理解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的特征”。他特别用括号注明,这些思维方式和社会特征,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是,要的是理解,而不是对立。

这也就是说,他把事情拉到了“理解一时难以理解的思维方式”之上,毫无疑问,这已经是一个文化课题。不少中国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一来,他把事情讲小了。其实,文化的课题永远也不会太小。

我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曾经为文化拟订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种有关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

根据这个定义,文化的隔阂,也就包括着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这三个方面的全方位对峙。这种隔阂和对峙一旦产生,要解除极不容易。人类历史上种种长久不解的民族对立,都与此有关。筱原先生就是试图在这中间,做点事。

那么,筱原先生在这本书里是怎么做的呢?我不妨随手举出两例——

不少准备到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家咨询筱原先生：
听说中国人常常不遵守合同，这是真的吗？

筱原先生说：在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当事双方的
信赖关系，而不是合同。如果建立了信赖关系，一有风吹
草动，中国人就绝对会为你两肋插刀。

还有一些日本人问筱原先生，中国人是不是很懒惰？
他回答，可以去看看万里长城。他认为，现在在中国遇到
的那些不良服务态度，原因在管理体制。

从一系列具体问题中，筱原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之所以要说中国人至今仍生活在武侠世界
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讲义气、守信用放在第一位。
日本人说中国人违约背信，但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才
是谎话连篇。因为中国人即使是酒后失嘴，也无论
如何都要践诺。而日本人呢，要么说酒后戏言不
能当真，要么说请示领导没通过，脸不红心不跳地一
推了事。

顺着这个思路，他又说：

中国人依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赖程度决定成事与否，而日本人却扛着财团或大企业的名头牌面行事。

我并不完全赞同筱原先生的分析和结论，觉得他似乎把很多事情说得过于简单化了；但是，我却欣赏他把表面上的是非之争拉升到了思维习惯的不同，而思维习惯背后，那便蕴涵深厚的文化分野了。

中国人是不是真像筱原先生说的那样，至今还生活在武侠世界？这个问题自另当别论。但是他的这种立论也许能幽默地提醒日本那些反华作者：你们今天在恣意糟践的，很可能是一种云烟缥缈的古典遗形。一千多年前，你们的祖先曾以“遣唐使”的身份扬帆破浪，去拜访那一个个掩映在华夏山水间的侠义世界。那些世界，确实与现代生态颇多支离。

筱原先生在这本书里更吸引人的段落，并不是探讨千年结论，而是描述万里山水。那些城市，那些风俗，那些朋友，那些艺术，他都写得生动、有趣。而他写到站在上海一个宾馆窗口反复眺望与自己早年生活有关的街巷，深情回忆已逝的中国老人，更是动人的散文笔墨。

三

然而,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现实:中日民众之间的情绪沟壑,包含着太多战火刀戟、血海深仇,确实不是一般的文化论述所能填平得了的。

我在年轻时代,曾根据当时看到的一些中日友好景象,过于乐观地以为,这里有可能创造“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奇迹。现在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由此,我对世间的爱恨、人类的前途、文化的目的,都增添了不少悲观成分。直到今天,这种悲观成分还没有减少,成为我心中的霏霏冷雨,时时产生寒噤。

回想起来,我多年来也曾一再地企图用文化之力,减少世间裂隙,并以中日民众间的关系作为试验性的着力点。

例如——

2000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并结束太平洋战争五十五周年,广岛市召开和平大会,特别邀请我参加。会上,由原子弹受害者代表、投掷者代表发言,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都上了年纪。我是第三方发言者,代表被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民众。我上台发言前,好几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站在我身边,

为我担心,不知道我会讲什么。等我讲完,他们都很满意,广岛市的市长也很满意。

五年后,2005年7月20日,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我是唯一的中国演讲者。我演讲的内容是反驳“中国威胁论”,希望持论者们能够学习四百年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花三十年时间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终于摆脱了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威胁”感。

又过了五年,2010年5月21日,我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在上海世博会上进行公开对话,话题是联合国在当天发布的有关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报告”。我的讲话重点,是批判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以免世界各地继续以“文明”的名义产生种种冲突。其中,我又举了中国和日本例子。

再过两年,2012年9月29日,日本京都举行中日关系正常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又被邀为首席演讲者。但是,大家都知道,由于东海局势的突然变化,我失去了演讲所需要的学术气氛,只能宣布退出。这件事,让我一直对研讨会组织者,也是我的著作的日文译者加藤千洋先生深感歉意。但大势如斯,已经顾不到个人情谊了,等以后弥补吧。

——这整个过程,让我百感交集。我的每次被邀,都因为我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者,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却又浸润了中华文化,考察了世界文化。他们也许想从我这里试探一下文化跨越族群的各种可能性。但是,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还能做什么,更不知道21世纪世界文化在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之外,还能在心灵的互融互温方面,开拓出多少空间。

在记忆中,就在2005年7月我到世界文明大会演讲的那一次,筱原先生长时间陪着我和我的妻子,还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游玩了日本好几座城市。我在大会上演讲的日文翻译,倒不是他担当的,因为那个大会有周密的语言服务系统。风雨飘摇的八年过去了,我很钦佩筱原先生在越来越不容易的情况下还在做文化沟通的难事,更钦佩他用善良的心态、轻松的口吻、感性的叙述来“攻坚”。相比之下,我以前那么多演讲的文化企图也许过大了,还不如筱原先生这样的娓娓而谈,可能会让更多普通读者从温润的语言中有所憬悟。中国古人说“润物细无声”,大概就是这种情景。此事似细实巨,恐怕只能托付给更多的人,托付给漫长的时间了。

四

因为是朋友,我还想对这本书提一点建议。我觉得,谈中国文化,还应注意一个庞大体量的农耕文明以一种“低消耗、非极端、赖天时、重人情”的中庸之道来维持儒家理想的数千年一贯性。这中间,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时间,是读解它的两大关键。相比之下,以墨家为源头的侠义,虽然长存未灭,却只是一种边缘性的民间补充。

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到筱原先生。由于读了这本书,我一见面就会对他说:善良和轻松是会有回报的。小回报,让作者增加很多朋友;大回报,让世间减少一些仇恨。一增一减,都是文化的份内之事。

顺便要说一句,这本书写到台湾的部分虽然篇幅不大却很精采,我读起来处处引为知音。我对台湾也很熟悉,很想什么时候约着筱原先生一起到那里玩玩。到时候,我会给他介绍大量台湾朋友,那可热闹了。

2013年6月16日于上海

前言

走进日本的书店，一眼望去，与中国相关的书架上全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无赖论”之类的反对中国、厌恶中国、污蔑中国的腔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此情形使我想起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形势，虽然那时日本人去中国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人能来日本的也仅限于文化、艺术、体育代表团，但中日友好的气氛却是那么热烈。而现在，每年去中国的日本人已经突破了四百万人，每年来日本的中国观光客也已超出了一百万，中国的富裕阶层更已成为东京高级百货店的座上客，可两国之间的气氛怎么反而变得如此不友好了呢？

日本这边反中、厌中、蔑中一面倒，中国那边的反日

情绪也很高涨。其因果关系就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以判断。

于我本人而言,从第一次访问中国开始,与中国交往了近四十年,在中国香港留过学,在中国家庭寄过宿,还与中国人一起住过学生宿舍。若再往前推,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对中国开始关心时起算,距今已经超过四十年了。

怀着对中国的强烈关心,我曾几次访问过“文革”中的中国,之后由于工作关系,在美国和东南亚经历了十年职业生涯,待再次踏上中国大地时已是1989年,虽说中国当时已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我看到的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才开始真正迅猛发展,让我耳闻目睹了中国各地的巨大变化。

我看到,中国急剧的改革开放也带来了种种反面现象,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贪污腐败频出、贫富差距加大等,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也强烈地感到了中国、或说中华民族的底气和能量,有朝一日,当中国到了某种程度的富裕时,这种能量一旦从经济建设转向文化建设和新文明创造,中国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